

# 梁晓声

卷

## 「走向诺贝尔」

# MARCH

# TO

# NOBEL

# MARCH

# TO

# NOBEL

# MARCH

# TO

# NOBEL

# MARCH

# TO

# NOBEL

# MARCH

# TO

# NOBEL

# MARCH

# TO

# NOBEL

# MARCH

# TO

# NOBEL



文化艺术出版社



# MARCH



NOBEL

TD

MARCH

NOBI

NOBEL

NOBEL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诺贝尔·梁晓声卷/梁晓声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5

ISBN 7-5039-2182-X

I. ①走… II. 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807 号

## 走向诺贝尔·梁晓声卷

著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蔡志翔 董 耘

封面设计 弘泰武仕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mailto: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182-X/I·978

定 价 24.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自序

出版社要求我为自己的这一本集子写篇自序。那么，我得服从。

我这一本集子，只不过是出版社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这一套丛书的出版创意，和“诺贝尔”三个字发生了联系。在我的记忆中，出版社似乎已经是第二次向我约稿了。第一次我婉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写作二十余年来，倘没谁非将“诺贝尔”三个字硬对我提出来，我是连想也根本不去想它的。

足见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向的人。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也没有什么崇拜。

我根本没有那个情结。

倘有那个情结，就难免每每地会被它支配了自己的写作方向。

我不愿意被那样。

我深知，如果我不那样，还会写的自然些。一旦那样了，我的写作状态也许就糟了。

说到底，写作只不过是职业，并渐成我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一个人的职业恰恰是他所喜欢的事，这乃是人生的一种幸运。

我既获此幸运，只管认真写下去就是。通过勤奋，为有文学阅读习惯的人服务而已……



## 作者简介

梁晓声，1949年生，山东荣城人，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为了收获》获《小说月报》第一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学者之死》获《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短篇小说《一只风筝的一生》获《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

# 目 录

I 自序

## 长篇

I 脸像兔子的女人

## 中篇

80 学者之死

122 激杀

161 大鸟

201 失聪

238 司马敦

282 贵人

332 沉默权

376 弃偶

## 短篇

444 捕蝗

## 脸像兔子的女人

星期一是这样的一天——对于有钱兼有闲阶层的男女人士们来说，是星期日优惠性质的贻赠。对踌躇志满者来说，像潜艇浮升或猛犬正从窝里往外爬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和价值体现在班上、体现在办公室内。他们的半成以上的野心和计划是从星期一开始付诸行动的。大抵如此。简直可以认为星期一是他们的海誓山盟的情妇。但是，对于时乖运舛之人，对于不愿上班又不得不上班的人，对于对自己的单位怀有敌意的人，一句话，对于一个倒霉的家伙，或者实际上并非是一个倒霉的家伙，而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倒霉的家伙，星期一好比最难逃避的法定的提审日。一般保释监外的犯人，劳教刚刚结束的小偷，总是要在星期一到派出所去接受垂讯的……

姚纯刚讨厌星期一。岂止讨厌，而且憎恨。

“哎，你还睡呀？”

妻子推了他一下。

他没动，也没睁眼。他当然的还想睡。不，其实他不想继续睡下去了。早就醒着了。一夜睡得挺实，也没和妻子做爱——尽管她是表示了那么一点儿意愿的，依依偎偎的曾企图唤起他的欲望，但他只亲了她几下，抚爱了她一阵，敷衍过去了。他当时倒不是不想。他当然也不是一个性冷淡的男人。实际上以前他这方面的要求强旺得很。即使有三个老婆也是对付得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过些挺值得回忆的以前。不是么？他没满足她也没满足自己，

乃因当时不知怎么的，倏忽地便想到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于是进而想到了单位那幢二层的灰不溜秋的小楼(它常常使他联想到一个哭丧着脸的，肌肤枯萎的小寡妇)，想到了第一把手赵景宇那种大腹便便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于是他那刚刚坚挺勃起的男人的伟岸器物，顿时软塌塌地变得无精打采了。是的，他真是太憎恨星期一了！

“哎，七点多了！”

妻子又推了他一下。

单位刚整肃过纪律。找木匠专门做了一个名牌板。一人一个牌儿。名字写在上面。谁进楼后的第一件事，都是翻自己那个牌儿。名字显示着了，则证明是上班了。一过上班钟点，就有专人察看。迟到者就得自己去财务科填一张表格，迟到几分几秒自己填(一律得用钢笔。不准用圆珠笔。当然更不准用铅笔)。领导迟到了也不例外。

他是单位的两位领导之一。

这项整肃纪律的新举措，是由领导决定的，是从第一把手赵胖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是由他向群众宣布的。所谓“领导决定”，几乎一向是赵胖子一个人的决定。赵胖子喜欢经常作出些决定。三分之一是正确的决定，三分之一是错误的决定，三分之一是愚蠢的决定。还有不少是谈不上正确或者错误，根本不作也罢了的决定。但赵胖子认为自己作出过的，包括准备要作出的决定，不仅全部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及时的，而且是非常英明，非常智慧，非常重要的。而它们几乎都是由姚纯刚向群众宣布的。在这一点上，似乎意味着两位领导者之间的分工。尽管赵胖子本人从未向他稍微暗示过。没有过丝毫的暗示仿佛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远的分工，使他格外感到屈辱、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受压抑。感到这个世界的趋炎附世和有失公正。他何尝不愿也从自己的头脑产生些什么决定，而由赵胖子去向群众传达和公布呢？他觉得事实上自己的头脑比赵胖子的头脑好。起码略胜一筹。他的头脑中也确曾产生过一些什么决定。但是，赵胖子对他

的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决定，不是一概地否定，便是淡淡一笑，说以后再研究研究。而事实上也就等于说那都是根本不值得研究的。仿佛对方将他从一名普通下属提拔为单位的第二把手，不过主要是为了能使对方自己多一张嘴。一张专职的，仅为代替自己向群众公布从自己头脑中时时产生出来的决定的嘴。

“当领导的，需要有不同寻常的头脑。领导的头脑是干什么用的呢？是为经常作出决定用的。如果领导的头脑没有这一功能，那么群众要这样的领导有什么用呢？”

赵景宇每天要说好多这样的话，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有时是在大小会上说，有时是在办公室内对他说，有时干脆是自己对自己说。一类像赵景宇那样的干部的自言自语。

每当姚纯刚听着赵景宇说这样的话。两眼认真地注视对方，一脸聚精会神，装出一副认真听取教诲的样子。可他心里却感到特别恼火。巴不得啪啪扇对方几耳光才解恨。因为对方的话似乎是在向他强调，他还不具备和对方一样有资格经常作出决定的头脑。因此实际上还远非一位领导。尽管他自己也明白，对方其实并没有，甚至可以说丝毫也没有他细细咀嚼出的那么一层含意。

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一，当他向群众公布到“领导也不例外”这一句时，赵景宇打断了他的话。赵景宇用手指敲点了几下桌子，他便缄口了，不往下说了。第一把手一贯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这位第二把手的话。不论是他们面对群众的场合，还是两人单独交谈的时候。这方式早就使姚纯刚觉得傲慢无理了。公平地讲，赵景宇并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也许他从来也没认为他打断别人话的方式有什么不妥。但是姚纯刚可不这么认为。姚纯刚认为，赵景宇应该这么打断他的话——“对不起，纯刚，我插你一句。”按他的想法，还应该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或者递他支烟。赵景宇讲话的时候，这两件事他是常做的。不为别的，为的是让群众看到并且相信，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是团结的、亲密的。可他讲话时，赵景宇从来也没想到过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是的。一次也没有。更没有过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支烟

递给他的时候。赵景宇的烟盒是不大往桌面上摆放的。想吸则从兜里掏出。刚吸着烟盒就入兜了。这一点也要公平地讲，赵景宇不是个小气的人。那仅仅是习惯问题而已。但在所有这些方面，姚纯刚觉得，群众一定会以为，他这第二把手，不过就是第一把手的副手而已。这常使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姚纯刚认为，当两个人面对不少人并坐着，其中一个人以手指敲点桌子的方式，打断另一个的发言或讲话，意味着是在表明自己的权力，表明自己有权随时打断别人。何况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别人”，是第二把手。但是连这一点，似乎也不全是赵景宇的不对。因为在姚纯刚成为第二把手以后，在赵景宇第一次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的话时，姚纯刚便牢记住了。好比一只聪明的受过训练的猩猩，牢记住了饲养者的某个手式。领悟什么手式是叫它干什么，并且表现了服从其暗示的情愿。从来也没流露过反感。可以认为，赵景宇打断他的话的方式，乃是他自己促使赵景宇形成的习惯。

那一天赵景宇打断他的话，以格外强调的口吻说：“对，领导者也不例外！在咱们单位，谁是领导者呢？我——”。自指了一下，又指姚纯刚：“当然，还有他。这一条是专对我俩而言的。我不例外，他也不例外。”

当时他的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了。

赵景宇是转业军人。调来调去的，到过几个单位了。因为曾是军人，在一切他工作过的单位，都当过分工抓组织纪律性的头儿。大概人们都这么认为——军人是组织纪律性严格的人。军人是最适合抓组织纪律性的人了。他自己也不免这么认为。既然连他自己都这么认为，别的头儿们更是乐于拱手相让。将如今凡是一个单位提起来都令头儿们真正头疼的这项不抓不行抓又非得罪人不可的工作，百分之百赞成百分之百信任地移交给他。他抓这项工作抓得十分认真。那就别提有多认真了。抓得严，严得很。所以他在哪一个单位都没能呆长。但是他似乎从来也没怎么思考过个中原因。只当每一次调动都是正常调动，是工作需要，是党的需要。

他是每天上班最早的一个人，也是每天下班最晚的一个人。倒并不完全是车接车送的优越性使然。的确确还在于他虽然转业了，仍严格恪守着那种军人特有的纪律性。北京车多为患，如果没有种自觉意识，车接也是可能经常迟到的。他是将也许频频遭际红灯，或者交通堵塞现象所耽误的时间，都预算在路途中的。所以“领导者也不例外”那一条，对他并不起什么实际的制约作用。正如毛主席生前常教导我们的——纪律是对自由主义而言。

与赵景宇相比较，姚纯刚可谓是个自由主义者，是个散漫惯了的人。当上第二把手以后，不像以前那么自由化了。但仍难变成一个遵守上班时间的表率，时常晚来早走。这就使他不免觉得，“领导者也不例外”那一条，仿佛是针对他一个人而定的。条例是他按照赵景宇的决定形成文字的，“领导者也不例外”这一条，是赵景宇在过目圈阅时加上的。他当时读到这一条时觉得极其尴尬。

这个星期一，姚纯刚不知赵景宇又将作出什么决定，也是根本没法儿猜到的。但是第六感官告诉他，肯定会有一项什么决定，早就储存在赵景宇的头脑中了，专等着由他去落实。

姚纯刚对此怀着极大的逆反，破釜沉舟地赖在床上偏不起来。

“我说，你今天究竟去不去上班了？”

妻子替他着急了。她不是再推他，而是拧了他胳膊一下。他终于睁开眼，从枕下摸出手表一看，差五分八点。

“不去了。”

他将手表塞在枕下，索性又闭上眼睛。

“你别装糊涂了，今天可是星期一！”

“我知道！”

他烦。

“那……那你请过假了么？”

“没有。你替我给老赵打个电话吧。”

“怎么说?”

“说我病了。”

“什么病?”

“反正是今天不能去上班的病就行!”

他仍闭着眼睛。

“感冒发烧?”

“大夏天的，谁会感冒发烧?”

“中暑?”

“刚早晨八点来钟，中的什么暑?”

“那……落枕了?”

“落枕就上不了班了?”

“那……拉痢疾怎么样?”

“……”

“急性的……”

他闭着眼睛，耐着性子听她继续编出他拉痢疾的原因。只要原因是令人信服的，他准备接受“拉痢疾”这一不那么情愿接受的设想。

“昨晚吃瓜，瓜萎了。你吃了好几块，结果就……”

“我怎么那么让人瞧不起?明知瓜萎了还吃?还吃好几块?一个瓜不才一元多钱么?……不行!”

“那你说你究竟为什么不去上班?难道让我照直说你是懒得去上班吗?”

妻子有几分火了。

她在替他编“病”时，他自己也在冥思苦想。他一向身体挺健康，编得不周密，会露破绽。露了破绽，就影响不好了。他的思路不愿和某些病沾边儿。那些病使一旦不幸真得上了的人，从此就会成为全部丧失或者多半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也就是成为了人们说的“老病号”。他才四十五岁。他还挺有信心地期待着自己将来能在副处这个职位上浮动浮动。也可以说他一直都在巴望着升迁。干部考核中有身体情况一栏，他可不干以小失大的事

儿，使四十五岁的自己被某种疾病罩上可忧的阴影，以至于将来仕途梗阻。他也不愿往某些龌龊的病方面去想，比如肝炎和某几种传染性皮炎，包括痢疾，会使别人听了敬而远之。失眠症或者贫血，他认为便是较雅的病。可前种病一向被视为脑力劳动者的专利。他虽然也属于一名准知识分子，但毕竟不是从事什么脑力劳动的，大小是个官儿。偶尔失眠一次，则请假不去上班，理由不够充分，似乎也显得自己太娇气了。如果说自己失眠严重，长久成症，又似乎会使别人犯猜疑——什么事儿使他天天夜里睡不着觉哇？当第二把手的人引导别人对自己进行这样一种猜疑，那岂非等于是存心搞黑自己的形象并搞糟自己和第一把手之间的关系么？贫血倒是没这些负面因素，但是又太女性化了。有着种种的考虑，想出适当的病就不太容易了。和赵胖子的头脑经常产生作决定的冲动一样，他的头脑经常产生的是优柔寡断的顾虑……

电话突然响了。它就在床头柜上。当然，客厅里也有。自从当上第二把手，晚间电话也多了，所以往卧室扯了一条线。

妻抓起电话，应答了两声立刻捂住，表情惴惴地说：“是老赵打来的，问你离家没？”

他全身也不禁紧张了一下。一急，急出了智慧。

“你就说我脚气感染，脚肿了，走不了路了。今天不能去上班了……”

“老赵哇，纯刚他脚气感染，脚肿了，走不了路了呢。以前……”妻子又捂住一端，对他说老赵问以前感染过没有？

“这你还用问我怎么回答？！”

他真恨妻子的愚蠢。这一请示是完全不必要的么！

“你还瞪眼！你还生气！你的事，你自己撒谎吧！”

妻一翻脸，也不捂着话筒了，塞给了他。

他一接过话筒，一听到对方的语音，条件反射似的，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样子。一种与刚才相映成趣的欢悦的样子。小狗儿见了主人往往就是那么一种样子。幸亏他只能听到对方的话，否则，会使他的妻子确信，他甚至会小狗儿似的在床

上大作摇头摆尾之状。

“我是纯刚啊！承蒙您关心，问得这么的详细。太感激了太感激了。是啊是啊，走还是能走的。只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脚上的问题么，离心脏远着哪。不必不必，我去我去。嘿嘿，谁叫我是给您当副手的呢……”

放下电话，他骂了一句：“妈的！”

赵景宇说派车接他。看来，对方有时候还挺需要他的，还真有些少不了他似的。这又使他多多少少感到那么一点儿安慰。

“恶心！”

妻子哼了一声，不屑再理他，悻悻地穿衣下床。

他也不敢磨蹭，赶快穿衣。穿好衣服，洗漱之前，不得不先化妆他的一只脚。将它缠上了很厚的几层纱布。

妻子探头进屋看看他，没好气地奚落：“你说你这不是自找的么？”

他则瞧着他那只缠了纱布的脚，很有些内疚地想，真是太对不起自己这只脚了。大夏天的！这不是等于自己惩罚了自己一次么……

他一只脚穿着拖鞋，坐赵景宇派来接他的小车，在八点四十分的时候离开了家……

“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是一个从属关系不怎么明确的单位。有时许多比它高的部门垂青于它，对它表示出特别主动的关心。关心的方式便是塞来一些极需解决待业问题的“人才”。有时又根本没有任何方面态度明确地承认是它的上级部门。因而它的处境像没娘的孩子。它至今仍靠十年前的一笔基金发放工资。这笔基金是一位海外华侨捐赠的。数目不算大，可也不算小，五十万，当然是美金，不是人民币。如果是人民币，早就坐吃山空了。前些年外汇储蓄利息高，所里人员少，据说光靠利息就差不多够发工资了。这几年不行了。这几年外汇储蓄利息降低了，所里的人员却由十几人增加到四十几人。已经开始吃本了。

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成立的?由哪些方面批准成立的?已经无据可考。因为它被盗了一次。盗贼没得到钱,自然生气。溜门撬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踩点儿”,要策划方案,并且担极大的风险。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谁白干一次,毫无收获,都是难免会生气的。盗贼一生气,盗贼就报复。但是也没敢把楼给放把火烧了。只不过把电话机一概地都弄坏了。把档案室的档案全部都不知弄哪儿去了。还在当时那一任所长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摊屎。这一次被盗,除了当时的所长一人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而外,更多的人倒是幸灾乐祸,暗暗快感。因为每个人都不但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的确确是人才,而且还可以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档案上记载过好多荣誉哪。一些社会名流和几位虽已赋闲但德高望重的首长们的题词或贺词,也同档案一起不见了。其后不久,当年赠款的老华侨在海外故去。于是它既中断了经济来源方面的续补,也失去了依恃。当年恩庇于它的几位名流和首长,如今健在的只剩一两两位了。所里曾派人去拜谒过他们。他们甚至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曾为一个什么“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写过字。他们很警惕地再三诘问——题词或贺词在哪儿?送来给他们看看。他们似乎有点儿怀疑是别人的假冒行径。所里拿不出什么给他们看,也不敢告诉他们被盗贼偷去了。因而希望他们继续予以关怀,哪怕仅仅是一种心理方面的关怀,也就嗫嗫嚅嚅地不便讲出口……

现在它好像是个孤儿。它想投入的怀抱,对方认为无利可图,惟恐成为包袱,不待见它,拒绝它的依托。主动找上门来,有心接收它的,十之八九,又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眼儿。分明的,差不多全是冲着它那笔基金。它当然不上当,怕投入到“狼外婆”的怀抱里……

前任所长预见到它已没了前途可言,金蝉脱壳,及时地调走了。接着又有几个人做买卖去了。正当它真正地处在风雨飘摇、鸟兽欲散的时候,赵景宇来当它的所长了。

赵景宇来得很顺利,顺利得连他自己也没成想。他曾是正团

级，套行政处级。调动时成了一个难点，高不成低不就的。他自己倒是一再地表示不挑肥不拣瘦。可人家干部部门不能不考虑。他没多大文化，又五十四岁了。现进行文化培养都来不及了。如今，五十四岁了又没多大文化，哪儿哪儿都不欢迎。他复转时，师部怕他想不通，预先找他谈过一次话，说：“老赵哇，你看，形势对你个人是这样的——要想再往上升，哪怕再升一级，也是根本没指望的了。你自己怎么打算呢？”他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了，心里自然是挺悲哀。悲哀也没用啊，他知道悲哀也没用，于是也就不悲哀了。干脆地回答：“那我主动打报告要求转业吧！”上级见他这么体谅上级的难处，挺感动的。许诺一定和地方打招呼，保证分配得令他满意。复转两年多，他竟调动了四次。姚纯刚的妻子，当时恰巧被临时抽调在干部精简办公室帮忙。她了解“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的情况，清楚它当时正没个头儿，建议联系联系，推荐推荐。于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亲自往所里打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偏巧又是姚纯刚。他正观看两个同事下棋，电话响了。

“是心理研究所么？”

他说：“不是心理研究所，是‘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是同行，但是两个单位。您若找的是前者，那就错了。”

对方忙说：“没错没错，找的就是你们。你们那儿是不是正缺个头儿啊？”

他说：“是啊是啊！”

对方说：“那给你们派去个头儿，是位各方面都挺优秀的同志，你们欢迎不欢迎呢？”

他说：“欢迎啊欢迎啊。我们正盼着一个好头儿来，治理治理我们这个没人稀罕管的破烂摊子哪！”

对方说：“那就这么一言为定了？”

他说：“同意同意。我们盼着这位各方面都挺优秀的人快点儿来！……”

放下电话，他继续观看两位同事下棋。他没问对方是哪个部门的。对方也没问他在所里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他一边接电话，眼睛一边瞅着棋盘。说的话，全是随口答言的话，根本没太把这件事儿当成回事儿。

下班后回到家里，他妻子问他，他才又想了起来，并说接电话的正是自己。

他妻子就责备他——你是谁呀？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一个单位呢？

他笑了。他无所谓地说——不就是给指派来个头儿吗？我了解我那些同事们，没谁愿意当那个所长。我们的确需要一个人来管管我们。没个人来管管我们，都像没头的苍蝇似的，非闹出些鸡鸣狗盗的勾当不可！

第二天，他将这件事儿跟所里的人们一“汇报”，不料炸了窝。群情激愤，议论纷纷。说是指派一个行伍出身的人来管我们这些搞心理学的，岂不是乱弹琴么？咱们也不能像群羊，谁来放牧都行啊！……

第三天，赵景宇骑辆不起眼儿的破自行车，车后座夹着只崭新的公文包，单枪匹马来到了“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

把门的老头儿不让他进，问他找谁。

他说他谁也不找，是来当所长的。

老头儿疑疑惑惑地嘟哝——不知道这件事儿啊！

他说：“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么？”

老头儿怕他是个精神有毛病的人，还是不让他进。在传达室里打电话，把能从各办公室请到传达室的人，都请到了。

众人见他不像是个精神有毛病的人，便相信了他的身分。相信是相信了，可都对他的到来当面表示冷漠。还有几个人围住他七言八语，情绪冲动地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态度平和的劝他还是明智点儿，另投庙门方为上策。说你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和我们这些搞心理学的知识分子搅在一起，今后能搅出好结果吗？

他倒显得挺有涵养的，一言不发，默默听大家说。等大家一